

范仲淹新传

程应镠著



范仲淹新传

程应镠著

上海大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顾孟武
封面装帧 甘晓培

范仲淹新传

程应镠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33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2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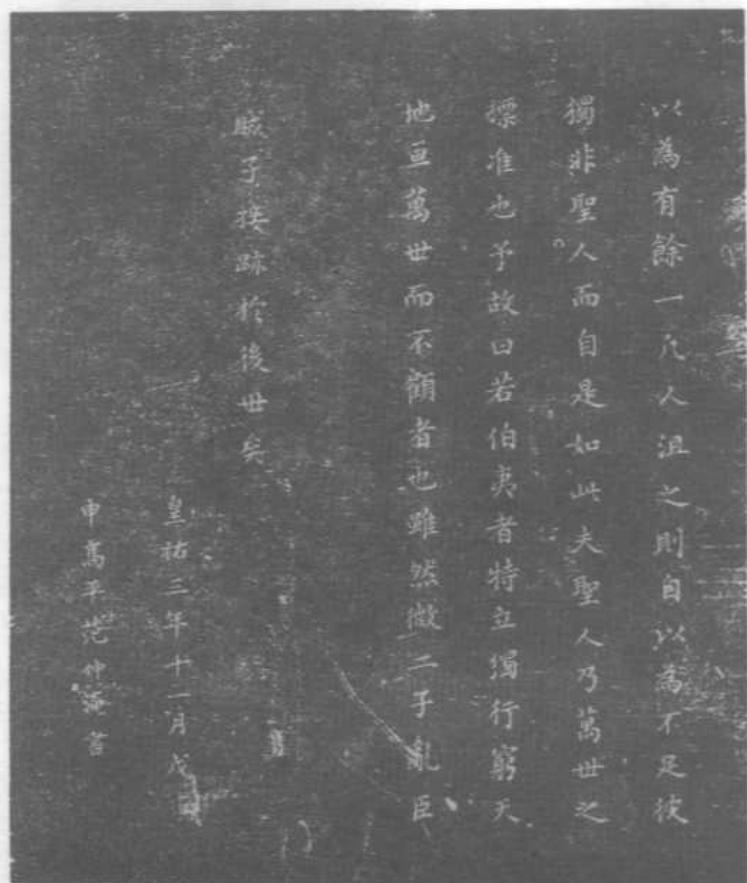
书号 11074·725 定价 1.10 元



范仲淹像

明 无款

(原件藏南京博物院)



范仲淹书《伯夷颂》
(原件藏苏州博物馆)

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六

律詩

依韻酬黃灝秀才

贈鍾道士

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

送魏介之江西提點

遊廬山作

瀑布

贈廣宣大師

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
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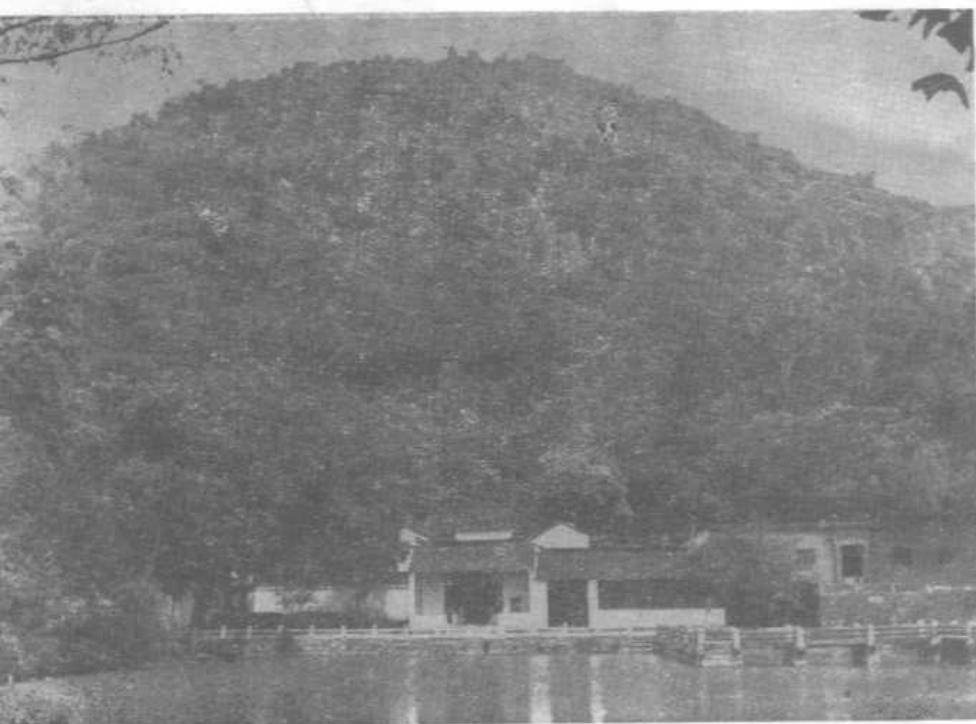
岳陽樓記

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
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
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
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
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
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

宋版《范文正公全集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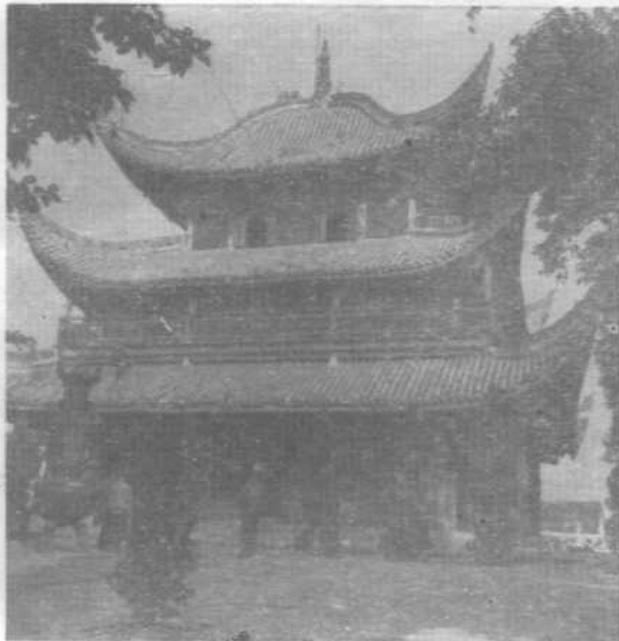
(原書藏北京圖書館)

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
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
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
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
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
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
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
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
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



苏州天平山范家祖堂

(江文成攝)



岳阳楼。始建于三国东吴，宋庆历四年滕子京重修，范仲淹为作《岳阳楼记》。此系一九八四年整修后新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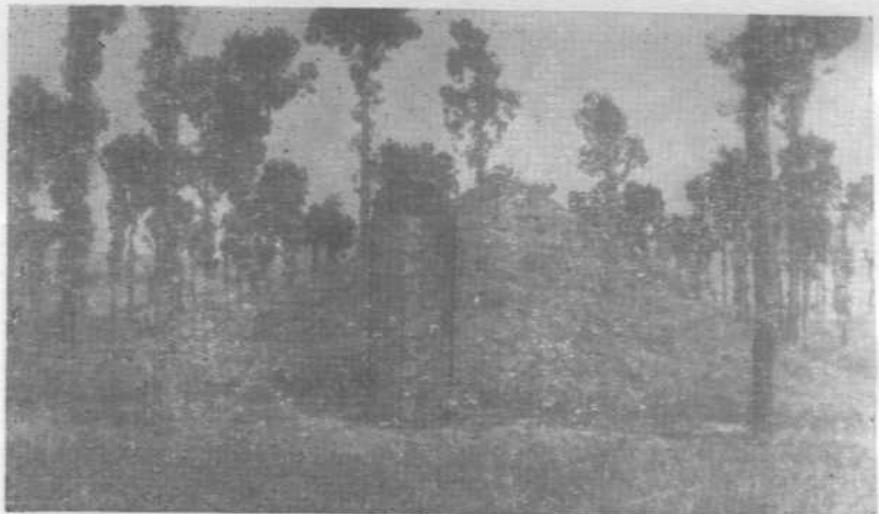
岳阳楼中清人张昭书《岳阳楼记》雕屏。



(以上均张中一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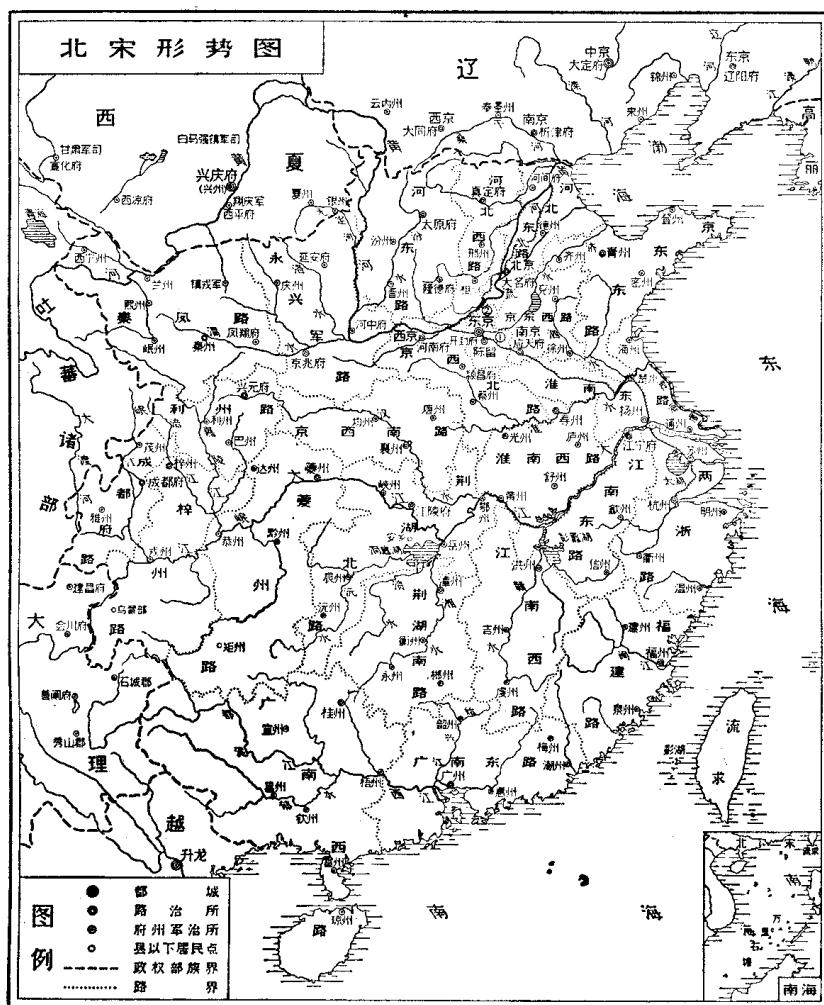


范仲淹墓全景(位于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)。



范仲淹墓近景。

(均谢槐青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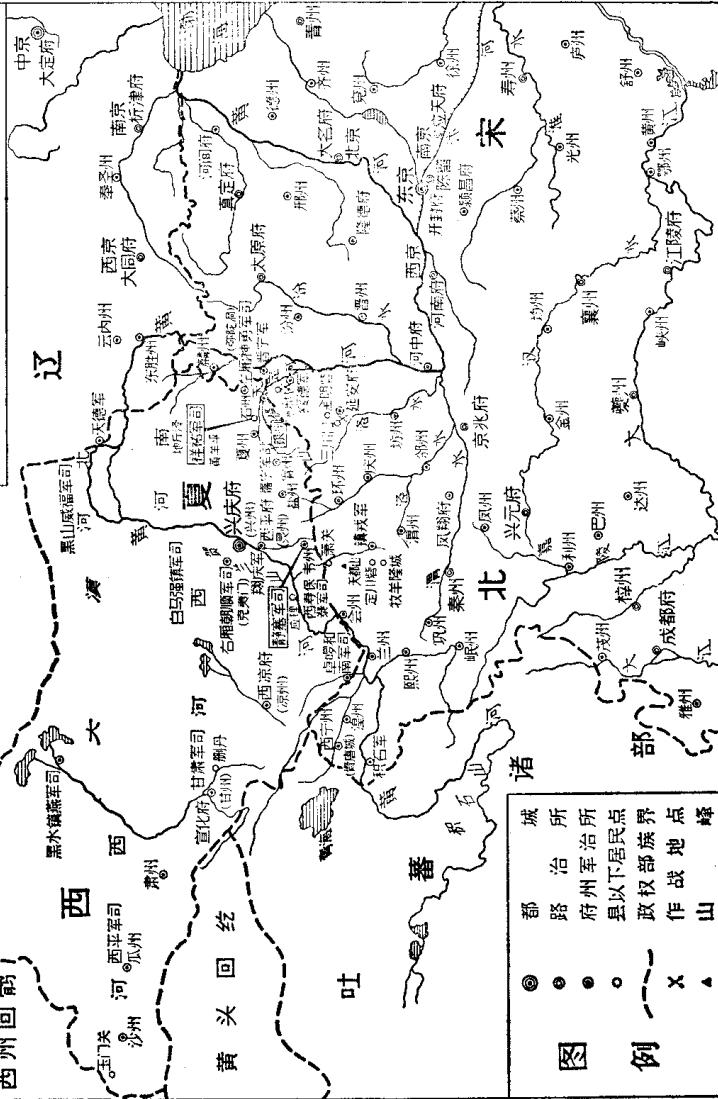


① 东经路 ② 皇东西北路

刘思源绘

刘思源绘

宋夏对峙形势图



先天下之忧而忧
后天下之乐而乐

范仲淹

自序

一九三七年十月，借读武汉大学，没有心思读书，便泛览名人传记，时忆幼年读《史记》的快乐。二十多年后，被迫弃离学问，也没有钱买书，偶然得读陆游传，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的念头。陆游是我极为佩服的一位爱国诗人，僵卧孤村，还有着为国远戍的梦想。那一位以天下为己任，忠于谋国、明于知人的人的名言——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——也是常常使我为国忘身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使我接触了大量的宋史资料；又过了二十年，我又可以自由地做学问了，于是，便决定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。一九八〇年开始，断断续续读《范文正公集》，随手做一些摘要，抄一些警语。读完了，便忙于定《历史大词典·宋史》的稿子，然后便是生病，住医院。这是八二年的春尽。出院时，已是盛夏，什么事也不能作，休息在家。旧藏宋人笔记多种，用以遣日，浏览所及，有关范仲淹的则漫录之。大约从十月开始，便在楼钥所作年谱的基础上，作传记长编，断断续续，花了一年的时间。八三年秋天，开始写第一章少年时代；寒假

多暇，上午没有人来，往往能成二三千字。八四年一个夏天，又断断续续的写，直到今年七月二十日，才全部写完。又花了十天时间，作事迹著作编年，这只是利用传记长编所搜集的资料和随事而作的考证加以简化，有些则是在传记中所没有提到的。做完了这一切，七月也就完了。这一天，正是四十七年前我从南昌动身去昆明的日子。

我早就有一种为这部传记写一篇序言的冲动。抗日战争的烽火，使我从北平至天津，转由秦皇岛直航上海，回到了故乡。然后又由武汉至潼关，渡过黄河，转战晋西吕梁、姑射山中。三八年春尽，又渡过黄河至延安，自延安南行，六月至武汉，在故乡又留了一个月。我曾把这一年所写的文章集编为《一年集》，列入《烽火丛书》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。这个集子是四〇年夏初编成的，我知道它出版，已是两年之后。在洛阳作了一篇序，送给一个刊物发表；这个集子四八年在上海重印，我事先一点不知道，这篇序也就为读者所不知，我自己不久也淡忘了。但我一想到这件事，总觉得有些遗憾。

我第二本书是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。当时，谁都不会发表我的文章，更不会出我的书。由于老友的见怜，要我在一套《中国历代史话》中选作《南北朝史话》。书写完了，很想写一篇序。六一年和六二年，对于历史问题，不同的意见已见于报端；六四年的初夏，又在酝酿一场批判。我对当时讨论的历史问题和批判，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虽然我并不相信自己这些想法一定正确。经过史话的写作，这些

想法更明确了，很想写一篇序，但这个念头，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，便放弃了。书稿是六四年春天交出的，这年初冬，出版社正式通知不能出版了。直到一九七八年，我校完了七七年在北京修改后的稿子，才写了一个后记，但所说的已经不完全是六四年我所想说的了。

任何一位作者，在他完成一部著作，或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，都是想说一点什么的。我过去却没有这样说话的条件，都只是在出版之后，或将要出版之前，说一点可以说的话。

《范仲淹新传》写作之前，我考虑了很久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。研究历史人物和研究历史一样，三十年来，都受到左的干扰，没有上正路；特别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人物，即帝王将相，是完全被否定了。要为这些人“树碑立传”，不仅要受到谴责，还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。八三年上海师院校庆，我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。十月去贵阳，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。十一月去南昌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。江西是我的故乡，我情不自禁地讲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，欧阳修和陈寅恪。回到上海，因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三十周年征文，我便写成了《谈谈历史人物的研究》那篇文章。《范仲淹新传》的写作，当然就成为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的思想的实践。

为范仲淹作传，我着重研究了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关系。对待宋仁宗，对待刘太后，对待晏殊，对待吕夷简，根据可信的材料，都作了叙述。对西夏用兵，韩琦、尹洙主张进

攻，仲淹却以为只能防御，朝廷接受了韩琦的意见，但他和韩琦、尹洙毫无芥蒂，其后不仅交厚，而且言深。为了处理晁仲约对待“劫盗”的事，他和富弼争得面红耳赤，富弼始终不赞成他的意见，他对富弼却没有任何疙瘩。契丹发兵进攻呆儿族，仲淹去河东之前，分析了这一情况，以为契丹将要撕毁和约，请发兵河东，豫为之计，否则他不能去。杜衍、韩琦不赞成他的分析，也不同意他的请求，在仁宗面前和他争论。韩琦甚至说，仲淹不去，我去，不要朝廷发一骑一兵。事过之后，仲淹去了河东，朝廷没有发一兵一卒，他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他的好友滕宗谅，有才能，有胆识，在庆州的时候，郑戬告他滥用公用钱，范仲淹极力为他辩护。仲淹和郑戬是连襟，对他很敬重。当月谏官欧阳修，也为滕宗谅辩护。仲淹也没有因为这样与郑戬失和。庆历新政失败，对于比他年轻的韩琦，殷勤期待的是“早归柄任”。这一切事实，完全说明了一位胸怀天下，以仁义为心，时时以为有仁义可行的人的志向。我在写《范仲淹新传》的时候，就努力把这样的事实叙述清楚，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。

封建社会中，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德，而所谓“德”就是事君事父，也就是所说的仁义礼乐孝弟忠信。南宋朱熹，编了一部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，又编了一部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，他所持的标准，就是这个德。范仲淹是一位“少有大志”的人，欧阳修说他：“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择利害为趋舍。”他自己说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他一生当中，做了一些事，但成功的不

多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这样一个人，能得到当时以及后世的称赞。南渡偏安，刘宰以他为北宋第一人。金元遗山说他：“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为名将，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，求之千百年间，盖不一二见。”（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八）是不是这就是人们之所以称赞他的原因呢？我以为这是值得研究的。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，是封建士大夫思想的精华。五十年代，关于道德继承的问题，曾经展开过讨论。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，是不是可以继承呢？从冯友兰先生、吴晗先生的议论中，可以看出，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是可以继承的。但地主阶级的道德可以继承，不能为当时的理论界所许可，冯先生便创为抽象继承说，但继承却永远是具体的。列宁说：“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——德国的哲学、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。”（《列宁选集》第二卷，四四一页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所继承的，不都是那样具体么？

我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，对于这样一些问题，想得很多。有一些，象上面所说的，是想清楚了。但我不在这本书里发议论，夹叙夹议也尽量避免。我着力于叙事，以及与事相关联的人。我以为这样作好了，其论自见。论从史出，我是坚信不移的。

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必须认真研究的。继往才可以开来。教育我们的青少年，叫他们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，我以为必须十分重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教育作用。从